

郑樵生
编著

史学入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史学入门

郑樵生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入门 / 郑樵生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301-13183-1

I. 史… II. 郑… III. 史学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5782号

本书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大陆地区出版发行简体字版本。

书 名: 史学入门

著作责任者: 郑樵生 编著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183-1/K·05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4.5印张 26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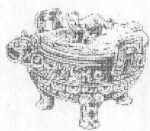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郑樑生，明史研究专家。桃园县杨梅镇人，先后毕业于台北师范学校、台湾师范大学、日本国立东北大学，获日本国立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修明史、日本史、中日关系史。曾任“国家图书馆”主任、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著有《明史日本传正补》（1981）、《元明时代东传日本的文献》（1984）、《明代中日关系研究》（1985，日文版于同年由东京雄山阁发行）、《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十一集（1990-2001）、《日本通史》（1993）、《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2000）、《中日关系史》（2001）、《日本史》（2002）。编校《明代倭寇史料》一~五辑（1987-1997）。翻译《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1996）、《东北军阀政权研究》（1998）等，凡40余册，另有学术论文百余篇。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横看，它由人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等等关系所构成，有无限丰富的内容；竖看，它波浪起伏，前呼后拥，永不停止地向前。它既是由人们有声有色的活动所构成，又是在各色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

出版说明

一、本书内容以研究历史学的方法为主，理论为辅。

二、本书内容以研究中国史为主。

三、本书取材于国内外学者之相关著作及作者多年来的教学心得编撰而成。

四、本书共 20 章，重在说明研究历史学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并论述中外学者所说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史学论著的写作方法与体例，介绍目前欧美学者研究历史科学发展的方向及几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五、编撰本书时，承蒙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松浦章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先生，北京大学图书馆沈乃文先生及淡江大学人事长、历史学系教授罗运治先生提供许多相关资料，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谨致深忱谢意。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学的方法论——前言	1
第一节 史学理论的发展	1
第二节 历史学的内容	6
第二章 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	12
第一节 一般的准备工作	12
第二节 基础知识	17
第三章 辅助历史学的学科	24
第一节 历史学与各学科的关联	24
第二节 研究中国史所需的辅助学科知识	27
第四章 史料学	31
第一节 史料的定义	31
第二节 史料的搜集	34
第五章 史料的分类	39
第一节 学者们对史料分类的意见	39
第二节 史料分类问题的探讨	43
第六章 史料的鉴别	47
第一节 史料鉴别的先决条件	47
第二节 史料的外形鉴别	49

第七章 史料辨伪	55
第一节 辨伪方法	55
第二节 讹误问题	59
第八章 史料的来源考证	63
第一节 外部考证	63
第二节 内部考证	66
第九章 史料的内容考证	70
第一节 可靠性的考证	70
第二节 史料的性质	74
第十章 史料价值的差异	80
第一节 史料的分等	80
第二节 对史料分等的批判	82
第十一章 史料的解释与利用	86
第一节 史料的解释	86
第二节 史料的利用	90
第十二章 史料的连贯与历史意义的把握	94
第一节 史料连贯的结构	94
第二节 历史意义的把握	97
第十三章 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方向	102
第一节 史学研究的新方法	102
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新方向	107
第十四章 历史的题材与思维	113
第一节 历史学的题材	113
第二节 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	123
第十五章 历史研究的对象	135
第一节 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各种学说	135

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出路	144
第十六章 史学的功用与史学家的修养	153
第一节 史学的功用	153
第二节 史学家的修养	157
第十七章 史学评论与历史人物评价	163
第一节 史学评论	163
第二节 历史人物评价	169
第十八章 治史与史学家的责任	176
第一节 治史的方法	176
第二节 史学家的角色与责任	181
第十九章 论文的写法	191
第一节 如何写史学论文	191
第二节 论文体例	196
第二十章 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	203
第一节 比较研究法	203
第二节 计量研究法	211
第三节 系统研究法	221



第一章

历史学的方法论——前言

第一节 史学理论的发展

一、史学理论的进步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只限于人类的历史，本书所说的更以中国史为主。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它的优良传统，主要是讲研究法。这是基本训练，不懂研究的方法，会读一辈子的书却终不能入门。

历史是一门揭示社会进步形式的多样性的科学，是一门为弄清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走过各种复杂道路的科学。它也像任何一门科学似的，如不把客观知识加以系统化，不将经验资料进行理论概括，如不从揭示所研究的那些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着手，从而深入到那些现象的实质中，它便不能存在。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杂乱无章，还是依一定规律进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是完全独立地脱离其他国家、民族、部落而孤立发展，还是不论其千差万别，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对这些问题，曾有不少人提出来进行探讨。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以至整个社会来说，满足其基本需要的，除精神外，首先是食物、衣着和住宅。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仍然是他们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历史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释各种各样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是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关系是怎样形成的？

19世纪以后，历史学已有显著的进步而形成一种科学，从而历史的方法论 (methodology)，即历史学研究法，也被精密地考虑。历史的研究虽自古即

有,当时便已有与历史相关的图书问世,至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历史学便逐渐进步,有关历史方法论的著作亦相继出现。不过,那些理论被有系统地串联起来,却是19世纪后半叶以后。然而,历史学并非因历史学研究法成立后才发达。所谓历史研究法,乃是对经由曾留下辉煌研究成果的尼布尔(Niebuhy, 1776—1831)、兰克(Ranke, 1795—1886)及其他许多史学家实际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作的统一而有组织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法的成立,并非历史学发达的原因,乃是其结果,此与先有语言后有语言学、先有文字后有文法之情形相同。

历史学在逻辑的性质上,虽与其他科学相异,却与其他科学一样,也属于经验科学之一;至于在论识真理的逻辑的本质上,则与其他经验科学并无二致。所以在本质上,历史研究法与一般科学的研究法相同。而它之所以被特别提出来探讨的原因,在于历史研究实际上复杂多歧,因此对初学者而言,宜将对这一门学问的研究法的基本知识作整体把握比较方便。众多前贤实际采取的方法,包含在他们汗牛充栋的著作之中,故无法轻易地加以把握、推敲。只因其将作为研究法加以组织的,就是把那些众多的方法予以统一整理而成者,所以那些方法便成为有志研究这门学问的研究者的基本知识,具有指导实际从事史学研究的性质。但那可说是实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抽象化,如要充分体会那些方法,就得从许多研究者的实际工作中学习,并靠自己的经验累积与磨炼,方才有所成就。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进行历史研究是否一定要先学习研究法,然后再搞研究?那可不一定。过去许多学者都是一边研究一边摸索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做多了,获得丰富的经验,也就摸索出一个方法来。只是他们的经验很少写成书来留给后人。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等到正确把握研究方法之后,方才从事研究工作,如能先学到若干入门的研究方法,那就会事半功倍。方法有如钥匙,没有钥匙,就开不了锁。

19世纪以后,有许多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著作问世,其中比较有名的为:格尔维努斯(G.G.Gervinus)的《历史学的特征》(*Grundzuge der Historik*, 1837);杜雷森(J.Gustav Droysen,又译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Grundriss der Historik*, 1867);弗里曼(A.Edward Freeman)的《历史研究方法》(*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1886)。在这三部著作中,杜雷森所撰者篇幅虽短,却值得我们注意。然而它们大体上都是部分的、片断的,欠缺整体的连贯性。将它们整理、统一成有组织的大作者就是班汉默(E. Bernheim, 又译伯恩海姆)的《历史学的教材与教法》(*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s*, 1889)。这是一本有关历史研究的划时代的著作。班汉默在该书再版时,曾把它增删成《历史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05)。[日译本书名为:《历史とは何ぞや》,东京,岩波书店。]

班汉默之后,在法国又出现了朗鲁瓦(Ch. V. Langlois)等人编著的《历史研究简介》(*Seignobos,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1893)。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平易而颇切实际,可与班汉默之书并称。英国历史学家贝利(G. G. Berry)称赞本书切合实际而将它译成英文,书名为: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在上述诸书之后,曾经出现许多有关历史研究法的著作,其中费达(A. Feder)的《历史学的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ik*, 1921)与宝亚(W. Bauer)的《历史研究导论》(*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 1921)等,系把整个研究法作简单扼要的叙述而便于利用者,它们均有新版问世。

台湾方面的相关著作有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王尔敏的《史学方法》相继问世,中国内地则有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陈其泰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韩学儒、吴永涛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及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合编,郝名玮译的《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英国学者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合译的《历史的观念》,王旭东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安作璋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可以参考。

日本学者撰著有坪井九马三博士的《史学研究法》,它大致依据班汉默的著作而来,不过他已把班汉默的话完全消化而从日本史中举出许多实例,乃是已逸出翻译范畴的好书。黑板胜美博士的《国史研究法》、《史学概论》,与野々村戒三的《史学概论》,林健太郎的《史学概论》,永原庆二的《历史学叙说》,今井登志喜的《历史学研究法》等,也是这方面的佳作。

从本质上来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乃一般科学的研究,故其推理方式亦复如此。不过,它只是对于名为历史学的特殊形式之科学的应用而已。然因

历史学在其认识的对象,及其成为研究基础的资料之广泛上,其特殊性甚为显著,因此,在事实上,它的研究法具有相当独特的形式。故其部分观点与工夫虽因人而异,但大体上的组织却有显著的共同点。这共同点实可说是根据杜雷森所提起、由班汉默所扩充的轮廓而来。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确立与其变迁

中国传统史学从产生到确立,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封建制开始孕育,王室衰微,各国政权下移,各国之间的战争和往还频繁。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历史记载不再是官方文书和诗篇的形式,而逐渐发展为按年代先后连续记载的编年的国史形式。春秋晚年,孔子依鲁国史修成了《春秋》,记载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间 242 年史事。《春秋》在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及注重在史书中表明作者的思想观点,而对后代士人以至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物重视史学的风气,也有深远影响。所以孔子修《春秋》即是中国史学的正式产生。这是传统史学确立的第一阶段。不过《春秋》有亟待克服的缺陷,它记载过于简略,记一事,最少的一条只有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或“螟”,也有二三个字的,如“城郛”(成公四年冬)、“宋灾”(襄公九年春)、“公如齐”(宣公五年春),一般不过十字上下,最长的也只有四十五字,如“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定公四年三月)每每离不开后人对它作解释。尽管记载得很简略,它对史学的发展却是影响深远。史学的发展期待着成熟的著作出现。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正是这样成熟的巨著,它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史记》的产生,意味着传统史学确立期达到新的阶段。

继《史记》之后,班固在东汉初撰著《汉书》,对传统史学地位的确立,进一步作出了贡献。从传统史学的脉络看,班固从多方面继承了司马迁的成就并加以发展。《汉书》记载了秦朝的崩溃,刘邦立国的功业,汉朝经由前期的上升、发展,至武帝盛世和“昭、宣”中兴,以后西汉衰亡,王莽代汉至灭亡,都贯串着从政治成败、人心向背及经济状况、用人得失等方面来观察和解释历史。这正是对司马迁“原始察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汉

书》宣扬汉朝功德，同时又对西汉政治的阴暗面不加隐晦，对统治阶层人物的荒淫、残忍多所揭露。班固推崇儒家，又处在西汉武帝以来尊儒的环境中，却能痛切指摘以儒学进身获得高位者的虚伪庸俗，以及章句之儒从事繁琐主义的有害倾向，这些又是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发扬。其次，班固解决了司马迁以后历史编撰的难题，并创造了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更迭相适应的史书形式。由他创立的纪传体巨著，成为日后编撰史书者之蓝本，其体例上严密整齐的特点亦为后人所效法。由于班固在史学思想、史书内容、历史编撰上获得了一系列极有意义的成功经验，自孔子创始、由司马迁奠基的传统史学，至此全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此后，传统史学在其演进的 1500 年中，在史书数量、著作门类和史学范围扩大等方面继续进展，并出现了《三国志》、《后汉书》、《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名著，分别在纪传体断代史、编年体通史、史学评论和典章制度等领域有所成就。至元、明两代，传统史学并无什么发展，故未出现成就突出的名著，且在史书编撰上因袭倾向甚浓，其中尤以纪传体“正史”为然。

迨至清代，史学的发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开始有所变化。明清之际，史学界出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杰出学者，从而使中国史学朝向近代化发展。鸦片战争（1840—1842）以前，传统史学已开始孕育具有近代意义的积极因素。清初早期启蒙主义思潮产生，出现强烈的反封建专制思想，乾嘉时期，朴学家中形成了严密考证的方法，章学诚则倡导学风的转变和历史编撰的变革。鸦片战争以后至 20 世纪初，近代史学从逐渐酝酿到正式产生。起初是要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后来在史书里介绍西方政体，然后运用进化论哲学思想，提出新的史学理论，并在历史编撰上实现了革新。

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转变成为近代史学，乃由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输入给中国史学带来刺激和推动作用。亦即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唤起中国学者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复因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与国家学说、竞争观念、进化论等之先后输入，使中国士人的视野更为开阔，促使 20 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并利用那些新知识从事史学研究。

除欧美思潮的输入外，中国史学本身学术思想的逻辑发展，也成为传统

史学转变成成为近代史学的内在基础。因为中国传统史学里有近代因素的孕育，有继续前进的外在基础与内在动力，使得所吸收的西方化这一外因能透过内因而起作用。例如：魏源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中倡导了解外国，对西方民主制度表示向往，此乃对两千年来封建思想的突破。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汉书·盖宽饶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清初黄宗羲把这种思想发扬光大，顾炎武也对专制统治痛加抨击。至鸦片战争时，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因而激发了魏源尖锐地批判专制，向往民主，赞扬议会民主制。所以，传统里的民主思潮，是近代接受西方民主学说的基础，也成为近代史学的思想灵魂。

比较研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它能推进我们的认识能力，开阔视野，使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更加准确，更为深刻。事物的特点与意义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并因适当的比较而相得益彰。所以如要了解一个既定的历史时期，就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和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如要研究某种工业的生产、流通的特点，就不仅要研究它们本身，还应以之与从前工业的生产方式做比较，与生产关系程度不同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做比较。比较研究方法的另一意义，是透过认识事物的客观联系去发现规律性现象，经由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达到抽象的概括，达到认识过程的更高层次。

第二节 历史学的内容

一、历史学与国民的意识

历史学这门学问究竟属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聚讼纷纭，但至少在想科学的历史问题时，实无法否定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特性。但若与社会科学的各种领域（例如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比较来思考历史学的特征，则它虽同样是社会科学，可是它与现实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是否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呢？例如：法律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非常明确。它在立法问题、应用法律的问题上、解释法律上的问题等方面，都与社会有直接关联。经济学则可通过对当前经济动向的观测来预测其未来发展，或提出与

现实相对应的政策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对社会作出贡献。与此相对，历史学这门学问在某种意义上并无实用性。非但如此，它在专门性知识，或为研究所需的科学性知识等方面，也无法直接提供给社会、国家运用。

那么，历史学是否就对社会完全没有裨益呢？事实并非如此。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对，在另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它与国民的历史意识有直接关联。

通常对历史的理解或看法，会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基准，或与思考方式、行动原理发生关联，对此我们通常用“历史意识”一词来表达，所以历史学在这种意义上，对国民意识有直接贡献而参与社会。即：其他的社会科学是透过其专门性、技术性的特点，与现实社会、国家发生关联，历史学则虽几乎没有这些特点，却以与国民大众意识或思考方式直接发生关联的方式，与现实社会发生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历史学这个学术领域里，常会有历史教育，或一般国民的历史叙述成为问题。故其学问本身原本便具有大众性与一般性。如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其大贵重任虽无法以双眼来观察，却可说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学既然具有如此特征，则我们必须思考今日的历史学界对这个任务到底能作何种程度的响应？从事历史学研究时，须特别重视研究态度与问题意识。在这方面，或许任何学术领域的情形都是如此，但对专门以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为研究对象、而无法避免对现实没有直接“裨益”这一特性的历史学来说，这点尤其重要。历史学在何种意义上对现实有所贡献？为此，今后的研究该从怎样的角度、朝什么目标来进行？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经常进行自我检讨，历史学研究便可能会经常陷于持悲观态度，或有变成纯粹为了兴趣而研究的危险。

二、历史与历史科学

历史，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它可分为自然发展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自然发展史较人类社会发展史时间久远，范围亦较广，只是我们通常并不广义地使用历史这一概念，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发展、发生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亦即与自然界相互倚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可凭主观愿望随意改铸的；历史是过去人类的活动而非断烂朝报、流年老账的堆砌。人类社会的历史大约已有二三百万年时间，即使从文字产生后算起，也已有数千年岁月。这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乃整个物质世界运动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它与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联系着，并且像自然界一样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但与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运动形式相较，人类社会则是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运动形式。我们以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然要注意，要研究这种运动形式的基本特点。

人为万物之灵，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活动，此乃人类创造历史的特点。在自然界里，运动系由一些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人类历史则不同，系人类透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依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这个特点并未使人类历史变得简单易解，反而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尽管每个投入历史活动的人都有自觉的目的，但历史的运动往往不依人们的目的确定最终结局。例如：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希图子孙后代永世为帝，结果却是二世而亡。丰臣秀吉为把天下传与亲生儿子秀赖而命养子秀次自尽，然而秀赖却为其妻千姬之祖父德川家康所灭。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入神气一时，大有征服全球之势，结果则是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善良的群众渴望美好的生活，却难于摆脱人间地狱；凶残的剥削者鱼肉人民，却高踞于人间天堂。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既有胜利也有失败；精心编织的阴谋诡计，既能得逞也会破产。历史的运动既有缓慢渐进的平静岁月，也有瞬息万变的风暴时期。但这毕竟只是事情的一个层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人们的思想、目的等，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绝非不起任何作用，或绝对无法实现。人们逐步认识着世界，改造着世界，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

人类的思维活动并没有减少人类历史的偶然性。人们从事历史活动时，既可表现为某些个别意向与历史结局不相符合，又可表现为某些个别意向与历史结局趋向相符，从而延缓或加快历史的进程，这就造成历史的复杂性。以往的众多历史学家、思想家，虽看到人类历史活动的这个特点，却无力认识这个特点。可见承认这个特点所带来的历史偶然性，并善于发现这种偶然性始